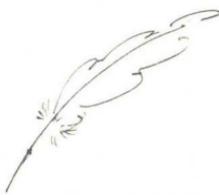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主编



[古希腊]柏拉图 Plato ◎著

柏拉图书简

Platonis Epistolae

彭磊 ◎译注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ÈS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主编



柏拉图书简

Platonis Epistolae

[古希腊]柏拉图 Plato | 著
彭磊 | 译注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柏拉图书简 / (古希腊) 柏拉图著; 彭磊译注.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8. 1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9359-8

I. ①柏… II. ①柏… ②彭… III. ①柏拉图 (Platon 前 427-前 347)
—书信集 IV. ①B502. 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8038 号

柏拉图书简

作 者 [古希腊] 柏拉图

译 注 彭 磊

责任编辑 王霄翎 李安琴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38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柏拉图书信的翻译和研究”(12CZX039)
结项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

“柏拉图九卷集”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相传由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文学家、数学家、星相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Θεράσουλλος）编订，按古希腊悲剧演出的结构方式将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九卷，每卷四部（对话作品35种，书简集1种，共36种）。1513年，意大利出版家Aldus出版柏拉图全集，被看作印制柏拉图全集的开端，遵循的仍是忒拉绪洛斯体例。

可是，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学界兴起疑古风，这个体例中的好些作品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所谓“全集”编本迭出，有31篇本或28篇本，甚至24篇本，作品前后顺序的编排也见仁见智。

俱往矣！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Les Belles Lettres*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陆续出版的希法对照带注释的*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以及Erich Loewenthal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编成的德译柏拉图全集均为36种+托名作品7种），当今权威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John M. Cooper主编，*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不断重印）即完全依照“九卷集”体例（附托名作品）。

“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推进当今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还得同时编修古代西方典籍。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属内的“古典学研究中心”拟定计划，推动修译西方古代经典这一学术大业。我们主张，修译西典当秉承我国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精神和方法——精神即：敬重古代经典，并不以为今人对世事人生的见识比古人高明；方法即：翻译时从名家注疏入手掌握文本，考究版本，广采前人注疏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36种+托名作品7种），篇序从忒拉绪洛斯的“九卷集”。尽管参与翻译的译者都修习过古希腊文，我们还是主张，翻译柏拉图作品等古典要籍，当采注经式译法（即凭借西方古典学者的笺注本和义疏本逐译），而非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如此注疏体柏拉图全集在欧美学界亦未见全功。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于1994年着手“柏拉图全集：译本和注疏”，体例从忒拉绪洛斯，到2004年为止，仅出版不到8种；Brisson主持的法译注疏体全集九十年代初开工，迄今也尚未完成一半。）

柏拉图作品的义疏汗牛充栋，而且往往篇幅颇大。这套注疏体汉译柏拉图全集以带注疏的柏拉图作品为主体，亦收义疏性质的专著或文集。编译者当紧密关注并积极吸取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不急于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於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新生。

刘小枫 甘阳

2005年元月

柏拉图注疏九卷集篇目

卷一

- 1 游叙弗伦（顾丽玲 译）
- 2 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 译）
- 3 克力同（程志敏 译）
- 4 斐多（刘小枫 译）

卷二

- 1 克拉提洛斯（刘振 译）
- 2 泰阿泰德（贾冬阳 译）
- 3 智术师（柯常咏 译）
- 4 治邦者（张爽 译）

卷三

- 1 帕默尼德（曹聪 译）
- 2 斐勒布（李致远 译）
- 3 会饮（刘小枫 译）
- 4 斐德若（刘小枫 译）

卷四

- 1 阿尔喀比亚德前篇（梁中和 译）
- 2 阿尔喀比亚德后篇（梁中和 译）
- 3 希普帕库斯（胡稼 译）
- 4 情敌（吴明波 译）

卷五

- 1 忒阿格斯（刘振 译）
- 2 卡尔米德（彭磊 译）
- 3 拉克斯（罗峰 译）
- 4 吕西斯（黄群 译）

卷六

- 1 欧绪德谟（万昊 译）
- 2 普罗塔戈拉（刘小枫 译）
- 3 高尔吉亚（李致远 译）
- 4 美诺（郭振华 译）

卷七

- 1 希庇阿斯前篇（王江涛 译）
- 2 希庇阿斯后篇（王江涛 译）
- 3 伊翁（王双洪 译）
- 4 默涅克塞诺斯（李向利 译）

卷八

- 1 克利托普丰（张缨 译）
- 2 王制（史毅仁 译）
- 3 蒂迈欧（叶然 译）
- 4 克里提阿（叶然 译）

卷九

- 1 米诺斯（林志猛 译）
- 2 法义（林志猛 译）
- 3 厄庇诺米斯（程志敏/崔嵬 编译）
- 4 书简（彭磊 译）

杂篇 （唐敏 译）

（篇名译法以出版时为准）

中译者引言

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述（《名哲言行录》III. 61），^①公元一世纪时，忒拉绪洛斯（Thrasylus）将柏拉图的十三封书简与《米诺斯》《法义》《法义附言》（*Epinomis*）一起划归为第九部四联剧。拉尔修称这些书简为“伦理的”（*ἠθικαί*），并一一列举了收信人的名字。^②拉尔修随后还列举了文法学家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 of Byzantine，公元前257—前150年）编排的三联剧，其中第五部三联剧为《克力同》《斐多》《书简》。由此看来，和柏拉图的对话作品一样，十三封书简的地位确立甚早，而且普遍受到承认。而且，忒拉绪洛斯和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都把十三封书简看成一部作品、一部戏剧作品，放在一部四联剧或三联剧的末尾，以《法义》或《斐多》为中心。进而言之，两位编者并未把这些书简看成“历史性的”或“传记

①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② 唯一有出入的是，《书简十》的收信人 *Αριστόδωρος* 被误当作了 *Αριστόδημος*。

性的”，而是把它们看成戏剧作品，十三封书简就如《法义》的十二卷一样（《名哲言行录》III. 57）。^①

在柏拉图之前，古希腊并未有独立的书简写作，但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喜欢以书简作为重要的戏剧元素，甚至好几次让剧中人直接在舞台上宣读书简的内容（《伊菲格涅亚在陶洛斯》行 727–787，《伊菲格涅亚在奥利斯》行 34–123，《希波吕托斯》行 856–880）。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也曾直接引述历史人物的书简，还谈到战争时书简传递的趣事（《原史》1.124, 3.40–43, 7.239；《伯罗奔尼撒战争志》1.128–132）。^②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除了柏拉图，还有一位修辞学教师也写书简，即和柏拉图素为对头的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 436—前 388 年）。伊索克拉底的主要著作是二十一篇演说词，但作为泛希腊主义的头号旗手，他还写有九封书简，全都是写给外邦统治者，包括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马其顿王菲利普（Phillip）、年轻的亚历山大，斯巴达王阿基达摩斯（Archidamus）等等，其中有四封鼓吹希腊诸邦联合起来征服波斯。如今，这些书简多被认定确实出自伊索克拉底之手，但属于虚构性的修辞创作。另值得一提的是，色诺芬

① Thomas L. Pangle 编，《政治哲学之根：十篇被遗忘的苏格拉底对话》（*The Root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en Forgotten Socratic Dialogu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页 4 注 6。

② 从这些文献记载看，古希腊最初的书信似应称为“信板”（罗念生译法），正如我们古人称书信为简牍、尺素一样。“板”乃是两块对折的木板，四面有边，中间涂蜡，以铜针在蜡上写字，毕后两板对合，加以封缄（详见周作人译，《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中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页 835，注 392；参希罗多德，《原史》7.239）。限于这种条件，书简自然要尽可能简短，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柏拉图长达数十页的《书简七》会否真的是一封“书简”。

在《居鲁士的教育》(4.5.26–34) 中也辑录或说编撰了一封居鲁士的书简，这封书简非常程式化，以 *χαίρειν* [祝快乐] 起头，以 *εἴρησο* [祝身体好 / 保重] 结尾，似乎说明当时的书简写作已有一套形式和规范。^①

在柏拉图之后，哲人的书简写作却流行起来。据记载，亚里士多德写有二十多封书简，其中有四封写给亚历山大，九封给马其顿大将安提帕特 (Antipater) (《名哲言行录》V.26)；学园继承人斯彪西普斯 (Speusippus) 则有一卷分别致狄翁、狄奥尼修斯和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的书简集 (《名哲言行录》IV.5)，从收信人就可看出，这些书简讨论的也多是政治问题。与之不同的是，菜园哲人伊壁鸠鲁也有三封致友人的书简，有赖拉尔修的全文抄录流传后世，但讨论的却是生死、自然学和天象学。尽管这些哲人书简都流传了下来，但和柏拉图书简一样，无不被真伪问题的疑云笼罩着，而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希腊化时期的托名书简写作风潮。

公元二、三世纪时，罗马帝国治下的泛希腊地区出现了一次文化复古，史称第二次智术师运动。这场运动力图重现公元前四世纪时雅典文化的辉煌，人们竞相模仿古代作品，出现了一种崭新的修辞作品，即假托古人之名拟作的书简，这种可谓“书信体小说”的写作形式既能通过塑造人物达到训练修辞技巧的目的，又能在短小的篇幅内展现个人的机智和学识，博人一笑，因而大为流行，至公元四世纪时，已经确立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类型。匿

^① 在柏拉图那里，有三封书简（第一、十、十三封）以 *εἴρησο* 结尾，两封书简（第五、十一封）以 *εὐτύχει* [祝你好运] 结尾，其余则没有明确的结束语。

名的作者们热衷于托名古代哲人（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希波克拉底、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演说家（埃斯基奈斯、德摩斯提尼）、政治家（泰米斯托克勒斯、狄翁、布鲁图斯等）、古代七贤（梭伦、泰勒斯等），^①尝试着从一种更私人和更切近的角度刻画古人的形象，或是虚构情节，或是依据历史材料，近乎一种传记文学的创作。在这些书简作品中，最著名的就是 37 封所谓的“苏格拉底派书简”（Socratic epistles）。苏格拉底派书简并没有多少哲学讨论，而是主要描绘了苏格拉底哲人圈子的交往和活动，常被分为以下六组：^②

第 1 至 7 封：托名苏格拉底；

第 8 至 13 以及第 29 封：托名寓居狄奥尼修斯二世宫廷的阿里斯提普斯（Aristippus）；

第 14 至 17 封：由不同写信人讲述苏格拉底的审判和辞世；

第 18 至 22 封：托名色诺芬或与色诺芬有关；

第 23 至 28 封：描述柏拉图在叙拉古的经历，其中第 24、

① P. A. Rosenmeyer, 《古希腊书简文学》(*Ancient Greek Literary Letters*), Routledge, 2006, 页 99。

② 当今辑佚古希腊书简最全的集子仍属 R. Hercher 所编八百多页的《古希腊书简集》(*Epistolographi Graeci*, Paris, 1873), 这里的排序便依据 R. Hercher。“苏格拉底派书简”的德文译注本有 L. Köhler, 《苏格拉底与苏格拉底派书简》(*Die Briefe des Sokrates und der Sokratiker, Philologus, Supplementband XX*, Leipzig, 1928), 但 L. Köhler 因为抄件问题删去了这里的第 25、26 封书简，因此其排序与 R. Hercher 略微不同。有些学者在标示某封苏格拉底派书简时，会同时注出它在两个编本中的次序，如“35 Hercher =33 Köhler”，便是指同一封书信在 R. Hercher 编本中是第 35 封，在 L. Köhler 编本中是第 33 封。

25、26 封托名为柏拉图，第 24 封由柏拉图致一位叙拉古的收信人，讲述自己想要隐居的意愿，第 25 封致狄奥尼修斯二世，引介一位叫克里尼斯（Krinis）的年轻人，第 26 封致叙拉古的朋友们，称赞他们忠于狄奥尼修斯，并敦促他们一如既往地保持忠诚；^①

第 30 至 37 封：托名斯彪西普斯，或以斯彪西普斯为收信人。

经过这场伪作风潮，现代人对古代书简多了一份戒心，事先总要问一句：是真还是假？真伪考证在现代蔚为大观，不过，在上面提到的这些书简中，柏拉图书简的真伪问题最复杂，争议最多。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学界，柏拉图作品的真伪普遍受到怀疑，疑古最甚之时，柏拉图仅余五部对话未被确认为伪书，十三封书简更是自不待言。^② 疑古风潮归于平静后，那些曾经的“伪作”如今绝大多数都已得到正名，但柏拉图书简依然深陷真伪之争的泥沼，不仅各封书简的真伪情况不同，甚至同一封书简内部也有真伪的划分——不少学者认为，《书简七》的主体是柏拉图所作，但其中 342a7–345a4 的“哲学离题话”（Philosophical digression）却是后人写就并窜入的。西方对柏拉图书简的阅读、研究，绝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在真伪问题上，鲜有精深的义理阐发。阅读柏拉图书简，首先要面对或清理的就是真伪问题，要排

^① 这三封书简曾窜入柏拉图的正典：1870 年，C. F. Hermann 编校的柏拉图全集（Leipzig: Teubner）就将这三封书简与另外十三封书简编在了一起。

^② 程志敏，《〈厄庇诺米斯〉的真伪》，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 16：柏拉图的真伪》，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页 3–9。

开这些有关真伪的意见，有必要系统梳理真伪问题的由来，借古今对照确立我们对柏拉图书简应持的态度。

尽管有着拉尔修所提供的明证，但意外的是，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学园成员从未提到过柏拉图的书简，这成为后世学者否认柏拉图书简的首要理由。^① 最早提到和引述柏拉图书简的是西塞罗。在《图库卢姆清谈录》中（V. 35, 100），西塞罗明确引述了“柏拉图致狄翁亲友的著名书简”（*praeclara epistula Platonis ad Dionis propinquos*），并将《书简七》326b-c 节译成了拉丁文。他还在《致家人书》（*Epistolae ad Familiares*, I. 9.18）中概述了《书简七》331c 中关于建议的思想。此外，《论善恶的极致》（*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 II. 14, 46）及《论义务》（*De Officiis*, I. 7.22）提到柏拉图并引证了《书简九》358a。由此看来，西塞罗至少承认第七、九封书简为柏拉图所作。

另外一位引证柏拉图书简的古典作家是普鲁塔克。他的《对照列传》将狄翁与布鲁图斯（Brutus）并置，并在写作《狄翁传》时运用了《书简七》的素材，甚至原封不动地整句转录，经常称“如柏拉图所写”。其实，早在普鲁塔克之前，另一位为狄翁立传的作家——与西塞罗同时代的奈波斯（Cornelius Nepos）就这么做过，^② 不同的是，普鲁塔克还解释了《书简十三》中的一个段落，为了刻画狄翁的性格，他运用了与《书简四》相同的语词。公元三世纪时，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us）

^① 亚里士多德说到过狄翁的叙拉古远征（《政治学》1312a-b, 《修辞学》1373a），但从未提到柏拉图与狄翁、狄奥尼修斯的交往，更没有提到柏拉图的三次西西里之行。

^② 中译见奈波斯，《外族名将传》，刘君玲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页 102-113。

多次评注《书简二》(《九章集》I.8, 2; V.1, 1-8), 并把这些书简奉为真迹。

其实, 自忒拉绪洛斯编定柏拉图的九部四联剧之后, 三十五篇对话和十三封书简在古代就很少受到怀疑。一般认为, 最早的怀疑者是公元五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大师普洛克罗 (Proclus, 410—485年)。这一习见皆因一位奥林匹俄多茹斯 (Olympiodorus) 所写的《柏拉图哲学引言》第26节记载: 神圣的普洛克罗把《法义附言》视为伪作, 而且还摒弃了《王制》《法义》《书简》, 理由是《王制》《法义》卷数太多, 且形式并非对话, 而《书简》的风格则过于单一, 于是, 普洛克罗就把柏拉图的著作减为三十二篇对话。^① 不过, 这位作者的记载恐怕并不忠实, 因为普洛克罗曾引用过某些书简并将之归诸柏拉图: 比如说, 他的《〈蒂迈欧〉疏》就多次引用《书简二》312e 及《书简七》328c、342e 等处。要断言普洛克罗是个疑古派, 看来颇值得商榷。

文艺复兴时期, 十五世纪初期最伟大的柏拉图译者布鲁尼 (Leonardo Bruni, 1369—1444年) 先后翻译过《斐多》《克力同》《苏格拉底的申辩》《斐德若》等, 最后又翻译了柏拉图书简 (1427年), 呈献给梅迪奇家族的科斯莫 (Cosimo de Medici)。在献致信中, 布鲁尼说明了他翻译柏拉图书简的理由:

翻译这些书简带给我极大的愉悦, 我仿佛在面对面地与

^① L. G. Westerink, 《佚名著柏拉图哲学引言》(Anonymous *Prolegomena to Platonic Philosophy*),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 1962, 页46。

柏拉图本人交谈，久久凝视着他，与他的其他作品相比，我更能在这些书简中发现他的身影，因为书简既不是虚构的对话，也没有归之于另一个人，书简中没有任何反讽和伪装（ironia atque figmento），它所描述的是这位最伟大和最智慧的人在严肃事态下不得不采取的行动。^①

布鲁尼继续说到，柏拉图在书简中通过行动表明，他本人就体现着他所教导的正直、自由、虔敬、正义等美德。在信的结尾，布鲁尼模仿柏拉图致狄奥尼修斯的笔调，语重心长地对科斯莫说：

因此，我要求你反复阅读这些书简，把其中的每一条格言都铭记在心，尤其那些关于国家事务的建议。你会明白我所说的意思，如果你用心把它们全都细细读过。……再会吧，望你通过阅读和行动表明，我的这份礼物并没有白费。

布鲁尼的翻译极具政治意图，称不上如今严格的学术翻译，但颇能体现佛罗伦萨当时的政治诉求。他力图把柏拉图塑造成一位“共和派”，是解放叙拉古僭政的首要力量，正是柏拉图激起了狄翁对自由的渴望，促使狄翁推翻了僭主统治。布鲁尼认定《书简十三》是伪作（他未加说明漏译的还有《书简二》314c7-

① 参见 James Hankins, 《柏拉图在意大利文艺复兴》(Plato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Leiden: E. J. Brill, 1990, 卷一, 注 104。书信体在文艺复兴时期重新成为政治修辞的重要工具，当时的作家接续西塞罗、小普林尼的写作传统，热衷于探讨书信写作技巧和原理，就此可参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奚瑞森、亚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页 56–66。

315a5), 也正是因为此简突出了柏拉图与僭主的亲密关系。受布鲁尼影响, 斐齐诺 (Marsilio Ficino) 1484 年在佛罗伦萨出版拉丁文版的柏拉图全集时, 同样拒斥《书简十三》, 未予翻译 (他另把《克莱托普丰》判作伪篇), 他还断定《书简一》和《书简五》的作者是狄翁本人。直到 1557 年, 文森特 (Antoine Vincente) 才将《书简十三》重新收入自己所编的柏拉图全集。^①

1678 年, 英国剑桥的柏拉图主义者柯德沃思 (Ralph Cudworth) 也否认《书简十三》的真实性, 他认为, 《书简十三》363b 对“神”与“神们”的区分说明, 作者不可能是多神论者柏拉图, 而只能是一位基督教作家。二十年后, 英国学者本特利 (Richard Bently) 发表论文《论普法拉西斯、泰米斯托克勒斯等人的书简》(Dissertation upon the Epistles of Phalaris, Themistocles etc.), 被认为是现代人考订古代书简的开山之作, 本特利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以公元前六世纪的西西里僭主普法拉西斯 (Phalaris) 之名传下来的书简, 并未详尽讨论柏拉图书简, 但从他对各封书简的征引来看, 他肯定柏拉图书简是真作。可以说, 在十八世纪之前, 柏拉图书简的真伪并未成为一个问题, 受到排斥的至多仅有第十三封。

随着现代启蒙思潮的汹涌而至, 柏拉图作品的真实性纷纷受到质疑, 在一番番“考订”风波中, 柏拉图书简自然不能幸免于难, 其所受到的冲击远远超过对话作品。1783 年, 德国学者迈纳 (Meiners) 首先发难, 否认全部书简 (尤其第二、十一、十三封) 的真实性。1816 年, 阿斯特 (Friedrich Ast) 继之而来, 在其《柏拉图的生平和著作》(Platons Leben und Schriften)

^① James Hankins, 《柏拉图在意大利文艺复兴》, 前揭, 页 306–307。

中对全部书简嗤之以鼻，声称这些书简根本配不上柏拉图的名字，仅对了解柏拉图的生平有所帮助，指责作者“粗野的自夸”（plumpe Ruhmredigkeit）。1820年，索瑟（Joseph Socher）的《论柏拉图的著作》（*Über Platons Schriften*）提出，《书简七》和《书简八》有申辩意味，可能是由学园成员在柏拉图死后不久所写，目的是为柏拉图在叙拉古的政治行动辩护。1864年，卡森（H. T. Karsten）发表了拉丁文论文《柏拉图书简考订研究》（*Commentatio critica de Platonis quae feruntur Epistolis*），在细致分析过书简的内容、风格、史实和学说之后，卡森总结说：这十三封书简均属伪作，尽管其中有着柏拉图对话和哲学的痕迹，但无一不是从对话作品中抄袭拼凑而成，故而风格散乱、粗糙低劣；这些书简约在公元三世纪上半叶编定，作者应当是一位或多为修辞学家，目的是为柏拉图申辩，展示柏拉图的生平及其与统治者的关系，但书简所刻画的柏拉图与柏拉图的哲学完全不符；在这些书简中，第七封最为重要，也是其他几封赖以编造的模式，第三、七、八封有较多相似性，应当出于同一位作者，是我们了解柏拉图生平事迹最古老和最可靠的材料。卡森的论文被誉为“第一份真正重要的考订”，直到今天仍然有极大影响，特别是他在各封书简之间、以及书简与对话之间所作的文本对勘，基本都被此后的研究者采用。受其影响，之后的哲学史家策勒（Zeller）接着认定，十三封书简全属伪作。

到十九世纪末，发端于德国的这股疑古辨伪浪潮稍稍平息，英国古典学者坎贝尔（Lewis Campbell）在其《柏拉图的〈智术师〉和〈治邦者〉》（*Plato, Sophistes and Politicus*, 1867）中倡导技术化的风格学分析，给柏拉图研究带来了一丝转机。但迟至1888年（坎贝尔的著作在德国长期不为人知），李特（C. Ritter）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